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瑶族 双寨

YAOZUSHUANGZHAI

——广西凌云县背陇
瑶和蓝靛瑶的调查与研究



周大鸣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瑶族双寨

——广西凌云县背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与研究

Yaozu Shuangzhai

Guangxi Lingyun Xian Beilongyao he Landianyao de
Diaocha yu Yanjiu

周大鸣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报告集——“中国田野调查丛书”之一。

本书是关于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的两个重要的瑶族支系——背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与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村寨的经济与生计模式、婚姻与家庭、民俗、宗教信仰、宗教、歌谣、教育、扶贫等,为读者展现了瑶寨生活的全景。本书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资料库,也为研究西部经济与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翔实、细致的参考依据。

责任编辑:马 岳 装帧设计:段维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瑶族双寨——广西凌云县背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与研究/周大鸣主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247-291-4

I. 瑶… II. 周… III. 瑶族—民族人类学—调查研究—凌云县 IV. K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9777 号

瑶族双寨——广西凌云县背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与研究

周大鸣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 zscq-bjb@126.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传 真: 010-82000893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25

责编邮箱: mayue119@139.com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5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二次印刷

字 数: 390 千字

定 价: 64.00 元

ISBN 978-7-80247-291-4 / G · 266 (248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序

周大鸣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人类学硕士。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复办以后，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单位。20多年来培养的人类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超过1000名，其中不乏国内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一批批人类学毕业生，带着探索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将走向何方的梦想踏入人类学的大门，又带着或许更多的追问去开创21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局面。

回顾中山大学人类学办学近80年的历史，坚持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和特色。每次田野调查都会积累很多好的经验，留下很多好的传统和故事，有些至今还经常被人提起。例如，1928年杨成志先生独闯凉山对彝族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回到昆明时，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给他题词，称之为“孤胆英雄”！哪怕是在抗战时期，中山大学颠沛流离在澄江、坪石，人类学的学生们仍深入西南地区调查瑶、傣、黎、壮等族。20世纪80年代初，梁钊韬先生虽年迈体弱，仍亲自到四川为其博士生格勒选点并耳提面命田野调查的方法；容观复先生68岁高龄时仍率学生到海南岛深入黎族村寨进行调查；199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三学生赴海南省通什毛阳镇进行调查，黄淑娉老师和龚佩华教授不顾年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晕船带来的折磨，跋山涉水，亲率学生深入黎族群众；2004年夏天，已经是73岁高龄的黄淑娉教授亲率两名学生深入到海陆丰畲族地区——黄先生40年多前调查过的地方进行回访……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学生们在田野调查中，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仅是对社会文化的研究，更是一种对学术的执著精神和做人的道理。

作为以异文化研究起家的文化人类学来说，不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无异于纸上谈兵。田野调查虽然被国内人类学者和相邻学科广为接受，但在中国讨

论如何深刻地认识田野工作的意义、如何真正地做好田野工作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涉及田野调查的目的和基本要求问题。人类学田野工作是用直观的方法观察人类行为，通过介入式的经历以及与不同社会人们的深入交往来研究一种文化。尽管人类学田野调查有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历程，但基本假设即人类学者研究的深度如何完全取决于在工作中被研究对象接受的程度。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被研究者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其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的方法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即使研究本文化或者研究自己生长村落的“家乡人类学”，同样也需要高质量的田野调查。这一点，费孝通先生很早就认识到，学习社会学必须联系实际，必须到社会实际中去观察、分析和思考。由于实地调查方法是从人类学那里学来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认真地去找人类学家学习，师从史禄国教授。考虑到具体的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本身具备的条件不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具体的时间要求，但离开了观察的准确性和深度，田野调查就达不到预期效果。

其次，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如果按照“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方式，可以说长期以来国人主流思维模式深受儒家文化“大一统”和“同一性”思想的“大传统”影响，从“天下为己任”、“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儒家追求普世的法则，强调“同一性”，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使读书人和知识阶层很容易潜移默化地忽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小传统”和民间文化中还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不很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已经为前人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已经写在书本上了。我们若不能接受这两个假定，自然应该另辟新路。”^①笔者认为中国国情非常复杂，人口和民族众多，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群体的亚文化丰富，了解这样多元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今天，田野调查的新路早已由前辈学者开辟，但仍需发扬光大才能更好地推动21世纪人类学的发展。

再次，是田野调查的“兼容并包”问题。调查研究并不是人类学的专利，田野调查方法也不只为人类学者独擅。从认识论上讲，田野调查的认识基础与

①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相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引入认识论，掀起了认识论的一次革命，揭示了认识的能动反映性、社会历史性、辩证发展性特征。而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由于“实践”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入的田野调查不仅是人类学的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黄宗智称：“其实费孝通那样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正在学术上体现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调查研究方法。”他称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重视社区田野调查的社会科学传统，“在国外，只有人类学才用这样的认识方法，而它主要用于对其他民族的研究，一般不会使用于本国的社会。但是在中国，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就是在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和政治学也常常如此。”黄宗智甚至认为，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历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参与式调查。^①当然，我们说因为研究主题不同、目的不同，一般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没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要求高，其往往追求通过调查达到对单个问题透彻了解的目的，而人类学往往运用整体观去研究文化，去展开调查，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虽然有时偏重于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如宗教行为等，却会很自然地意识到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和其他方面相联系的。就宗教而言，一种文化的宗教信仰不仅影响着该文化公开的宗教礼仪活动，而且与他们所吃的食物、各种日常活动、家庭结构等都有联系。人类学家可能会强调文化和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但一个文化完整的特征是不能通过孤立的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而认识的。尽管如此，不同学科甚至党政机关在长期的实地调查中总结的调查研究方法仍然需要人类学去正视，在批判中借鉴其精华。因此，人类学不能故步自封，盲目自信和自闭，要吸收别的学科实地调查积累的经验，同时也要加强跨学科的交流，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好方法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

第四，田野工作对人类学家来说是基础，但它并不是人类学家唯一的职责。人类学家一方面应用自己的工作获得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运用，尤其是有鉴别能力地运用其他同行的成果和一切文献资料，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历史研究取向的原因之一。

人类学的代表作以小型社区切入做深入的文化分析的民族志研究比较多。这就引出了人类学所研究的个案的代表性问题和研究视野的问题，甚至有人误以为人类学的研究仅仅是个案研究。有必要澄清的是，人类学绝非简

①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单的个案研究，人类学从不缺乏宏大视野。就学术训练来讲，比较好的途径是走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的路子。民族志并不等于个案材料的堆砌，也不是简单的经验性研究，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出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①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话题，也是人类学家致力于解答的问题，而发现“文化的规则”是人类学家解决“人是什么”的钥匙，是人类学最重要的主题。但发现“文化的规则”需要有更加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人类学创造了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入手的方法。通俗一点讲，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其实就是从点到线到面的研究。

从人类学早期的学术渊源来看，一直在运用从点到面和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回答与人类有关的宏大问题。人类学进化论学派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可谓极具宏大视野，他们将所有的社会形式放入一个线性的模型中，线性模型的两极分别是先进（文明）与落后（蒙昧），这样世界上已知的一切社会形式包括现存的和历史记载的都可加以比较衡量，而当时现存的原始社会无异于研究人类“落后”阶段的活化石，因而需要进行“点”的深入调查和“面”上的定性判断。这种单一的价值标准最终被多元价值观所代替，后来出现了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等学说，但人类学对文化本质的研究一直是最重要的命题，通过文化本质来研究人类本质。对文化本质和文化规则的研究，无论是单个村落、部落的文化本质还是族群与区域文化的本质研究，都需要超越纷繁复杂的日常生产、生活表象，了解蕴藏在被研究对象和被研究文化之后的规则和逻辑，把实践行动者自己没有用清楚的语言表明的道理，经研究者的再创造用语言表达出来。对于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更需要超越个案和调查点的局限，立足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和社会历史宏观分析，总结一般的理论与方法。

从研究的积累和层次上看，人类学者从单一的村落研究、个别的民族开始到族群与区域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符合客观规律。单一的村落研究好比人类学者在学科中学走路的阶段，族群与区域研究好比跑步的阶段，泛文化比较研究好比起飞的阶段，不经历前面的阶段，不打下相应的学术根底，一开始就介入泛文化、介入宏大视野的研究，往往容易流于空谈，好比空中楼阁。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微观的层次，而要循序渐进，逐步地介入中观（族

① 马凌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群与区域研究)、宏观(泛文化比较)的领域。从整个中国人类学界目前的积累来看,需要将研究重心逐步转入族群与区域研究,才能更好地进行人类学研究工作。当然,对于研究生和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还得老实地经历各个阶段。

历史的积淀形成了传统。在漫长的人类学学科建设过程中,人类学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教学的基础。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人类学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充实理论,学生的田野实践能力与科研创新能力呈互为因果的关系。自我系复办以来,田野实习一直是我系针对本科生开展的除课堂教学之外最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它不但是人类学学科调查与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传家宝”,也是我系培养本科生综合能力、提高本科生综合素质的“传家宝”。为了巩固、增强本科生的人类学专业知识、理论方法,以及开发、提高本科生实践能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本科生开设各类田野实习。这类田野实习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与科研相结合。本科生做人类学研究,的确存在理论体系薄弱、经验构架不齐等缺陷。但在本科生阶段的田野实习中,有意识地让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或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承担科研任务,则可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因此,我系针对本科生的各类实习中,增加了科研的成分,并尽量将本科生纳入老师的科研项目中。

二是与教学内容相结合。人类学的本科生应算是人类学科的初学者,他们的大部分理论知识来自于课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受教科书中所讲述的理论与方法,因此,为人类学本科生开设的各类田野实习,都要考虑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正是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田野实习的初衷与原则。

三是与学生兴趣相结合。兴趣是一切尝试的最初动力。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的田野实习,充分考虑到了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如组织学生到深圳民俗村考察,让学生在尽情体验少数民族风情、领略异族风光与文化、与少数民族人民齐舞共乐的氛围里达致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

四是与勤工俭学相结合。我系在各种田野实践中尽量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资金报酬,这使学生在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学生更好地领会“知识有价”以及人类学的社会经济价值。我系学生参与导师的横向课题一般都有一定的劳务报酬。

现在,11本沉甸甸的田野报告集摆在案头。这11本报告集依然循着总体的学术关怀和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在具体的写作上则根据所研究族群和地域的侧重点以及实际需要来展开论述,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形式。《龙脊双寨——广西龙胜族自治县大寨和古壮寨调查与研究》采取了大寨红瑶和龙脊

古壮两个族群进行比较研究，全书把调查和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分调查现状和综合研究两大部分展开论述。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村寨的经济与生计模式、婚姻与家庭、民俗、宗教信仰、宗教、歌谣、乡村教育、扶贫等。调查以现状为主，希望为读者展现两个毗邻而居的少数民族村寨——瑶寨和壮寨的生活全景；综合研究部分通过分析壮、瑶村寨所蕴含的乡村秩序，探讨山地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结构。《黄姚古镇——广西昭平黄姚古镇调查与研究》以专题论文，如经济生活模式、婚姻、家庭、宗族、医疗保健、社区权力与控制、精神文化（人生仪式、传统节日、民间信仰、娱乐方式、民间文学艺术）、教育、旅游的形式展开调查内容，叙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一个古镇持续经年，目前依然鲜活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广南阿科——云南广南阿科乡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调查与研究》分为11章，分别是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壮、汉、苗、瑶民族关系，亲族组织与社会网络，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差，教育类型、内容与人格形成，壮族的龙树及其变迁，疾病、治疗仪式与神灵观念，观音洞与民间信仰，苗族村寨的适应与变迁，瑶寨的社会组织与传统文化，较好地反映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阿科乡壮族、汉族、苗族和瑶族共生互融的文化全貌和社会发展。对居住在贵州省水尧、永康和三都等地的水族人群的叙述与研究则以田野调查的内容展开论述。这些报告集各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带队老师和全体实习学生的辛劳和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学子成长的见证。

中国的21世纪是变迁的时代，就像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讲到的那样：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智力发展史和道德发展史上充满大事而多变故的时期，此时那经常掩闭着的发现和变革之大门洞开。”我们所开展的田野调查，不仅引发了学子对人类学的兴趣，也引起了学生对人生、多元文化价值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更多、更深的思考。从调查中我们发现，文化变迁是如此的迅速，很多时候，当事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跟着感觉走了。反思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何尝不是这样？社会文化变迁形成的时尚、潮流等主流价值观往往淹没了时人微不足道的反思，更何况是对年轻人，喧嚣的流行文化之后是一片终极意义追求的苍白。谁也不用思考人类将走向何方，由跨国企业和大众传媒催生的消费主义，使人类沿着掩盖在科学光环下的能源消耗之路越走越远。部分村寨的调查反映出民族文化断裂使少数民族面临诸多的不适应；也有一些村寨里的少数民族还没有真切体会和零距离接触都市世界，他们的生存还只是对环境的简单适应，一些偏远山沟里的少数民族虽未与世隔绝，但远离所谓的现代文明。这两种迥异的生存发展

之路，究竟是哪一种好呢？相信不同的读者看完调查报告集后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怎样研究他们、认识他们也仅是一种答案，我们的结论也只是一孔之见——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和唯一的视角，然而正因为有了不同的视角和生活，人类也才有了更多的遐想，文化因而更加丰富多彩，意义的追寻之路也就更加富于挑战！



目 录

总序（周大鸣）	i
第一编 总论	1
第二编 陇法寨——背陇瑶	27
陇法寨背陇瑶的经济生活（王玉珏）	28
陇法寨背陇瑶的婚姻与家庭（路静）	57
陇法寨背陇瑶的宗教信仰（赵月桂）	70
陇法寨背陇瑶的传统民俗（林德丽）	80
陇法寨的歌唱传统（杨涛）	97
陇法寨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吕俊彪）	108
陇法寨的教育（杨建银）	122
第三编 金保寨	139
金保寨蓝靛瑶的经济生活（刘丹丹）	140
金保寨蓝靛瑶的婚姻与家庭生活（路静）	184

金保寨蓝靛瑶的宗教信仰（赵月桂）	201
金保寨蓝靛瑶的传统民俗（林德丽）	218
金保寨蓝靛瑶的歌唱传统与日常娱乐（杨涛）	238
第四编 综合研究	247
桃花源里可耕田？——从陇法寨看扶贫与发展（周大鸣 吕俊彪）	248
传统与现代的交响——金保寨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周大鸣 吕俊彪）	261
附件 田野笔记	275
陇法寨田野调查笔记（周大鸣）	277
金保寨调查日记（秦红增）	293
后记（周大鸣）	328

第一编

总论

一、研究概述

（一）研究经过

本书是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两个瑶族村寨的调查与研究。这两个村寨的居民是瑶族的两个重要支系——背篓瑶（背陇瑶）和蓝靛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村寨的经济与生计模式、婚姻与家庭、民俗、宗教信仰、宗教、歌谣、教育、扶贫等。我们的调查以现状为主，希望为读者展现瑶寨生活的全景，同时还结合前人的研究探讨了近80年来的变迁过程，并对山地瑶族的扶贫与发展进行了反思。

本次调查由笔者负责，参加的人员有2004届的本科生林德丽、刘丹丹、路静、王玉珏、杨涛、赵月桂，研究生杨建银，广西民族学院的秦红增副教授。博士生吕俊彪、本科生阮洛瑶参与了资料的整理和写作。本次调查之前，专门就田野调查方法进行了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参与观察、访谈、民族志写作、户籍分析、民间文献收集和分析、摄影技术、PRA方法等。而在实际调查中则以访谈（包括座谈会）、参与观察为主，辅以文献法和摄影。

田野调查从2004年7月10日至8月8日结束，时间刚好1个月，在调查点停留的时间为28天。7月11~12日在广西民族学院收集资料并请几位专家介绍广西壮族和瑶族研究的情况，13日到达凌云县，7月14~22日调查陇法寨，7月23日至8月3日调查金保寨，8月4~6日在县城收集资料，然后经南宁返回广州，结束调查。写作者2004年11月大多交了初稿，2005年5月交出定稿，随后进行统稿工作。

选择凌云作为调查点是基于如下原因：一是此次调查是学生实习与科研相结合，与985课题和教育部重大课题“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项目相结合，选择范围是珠江流域上游，包括贵州、云南与广西，而凌云位于百色地区，西江上游；二是凌云县是我国最早开始民族调查的地区，早在1928年就开展过调查，1929年出版了凌云瑶族调查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凌云也是重要的调查点，此次可以继续做追踪研究，更方便了解一个民族的变迁；三是选择的村落为瑶族，瑶族是珠江流域重要的族群，选择不同的分支，对于了解瑶族文化本身的多样性有重要意义；四是所选村寨的自然环境在山地民族里很有代表性，也是所有选点中条件最艰苦的，笔者作为系主任不仅要带头带学生实习，而且应该去最艰苦的地方，所以就选择了凌云。

（二）本研究的意义

凌云是一个多民族的贫困山区县，因为早期的调查是瑶族，所以本次调查

就选择早期做过调查的两个瑶族村寨，也就是把瑶族作为研究主体。选择瑶族进行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很有重要意义的。

首先，瑶族是分布广、人口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对瑶族的研究有利于了解中国的民族形成和族群关系。瑶族有240多万人口，分布在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江西6个省（区）的130多个县。其中居住在广西的有145万人，占60%以上。居住在湖南的有54万多人，云南有20万人，广东有14万多人，贵州有2万多人。在中国境外，还有60多万瑶族散居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加拿大、法国、瑞士等国家，瑶族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

其次，瑶族的研究起步早，有较厚重的积累，我系前辈很早就进入瑶寨进行调查研究，我们的研究是学术的延续和发展。20世纪初随着民族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创建后，民族学田野调查和实地研究开始广泛开展。如凌纯声、商承祖的赫哲族调查，林惠祥的台湾高山族研究，凌纯声、芮逸夫等的浙南畲民调查，陈序经、伍锐麟等的广东疍民研究，罗香林的粤东北客家研究，杨成志的云南彝族、海南岛黎族等调查，马长寿等的四川彝族、羌族、藏族调查，岑家梧的云南苗族调查，李安宅的甘肃藏族调查，等等。有关瑶族的研究很早已进行，我国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以对瑶族的考察最早亦最深入。

其三，瑶族的研究是国际化的课题，通过对瑶族的研究，有利于与国际对话，使我国的民族学研究走在国际学术的前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就深入到西南地区，对瑶族文化发生兴趣，发表了一些报告，如F. W. Leuschner所著《华南的瑶族》（1911年）；法国一批学者对越南北部山地民族的研究，如《东京北部的民族志研究》（1906年）、《东京山地居民》（1908年）、《印度支那民族志研究》（1924年）等。这些研究中都包括了对瑶族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相关研究减少，到20世纪50年代，又开始恢复。前苏联学者开始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而西方学者无法进入中国，则在邻近中国的泰国、老挝从事瑶族研究，如美国康奈尔大学隆巴德等编著的《瑶英词典》（1968年），日本白鸟芳郎主编的《瑶人文书》（1975年）、《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相连各族》（1978年），竹村卓二的《瑶族的历史和文化》（1981年），法国雅克·勒穆瓦纳的《瑶族宗教仪式绘画》（1982年）等。国际上也成立专门的瑶族研究机构，如“国际瑶族研究协会”、“法国瑶人研究会”、“美国瑶人团”、“国际瑶族研究会泰国支会”，研究人员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英、法、德、日、俄罗斯、瑞典、越南、老挝、澳

大利亚等。^①

其四,本研究对于了解山地民族生存状况、扶贫与发展有着实践的意义。由于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因而山地聚居的民族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山地民族由于所处环境,如气候条件恶劣、资源短缺、交通不便、教育落后、人地矛盾严重等,大部分属于落后地区。我国所划分的贫困县也大部分属于山地民族所在地区。因此,促进山地民族的发展一直是中国反贫困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次调查的瑶寨属于这类典型,我们通过解剖典型可为这类地区的发展寻找问题和提出建议。

(三) 学术研究综述

如上述,瑶学的调查和研究有很长的历史和坚实的基础,在我国有关瑶学的研究在解放后有较快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央组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瑶族进行全面的调查,出版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如《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1~6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到20世纪80年代,成立瑶学研究会,后来又成立国际瑶学研究会,在我国湖南、云南、广西、广东、香港和法国召开了专门的瑶学会议,出版了一些专著,还出版了《瑶学研究》,推动了瑶学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国家又拨专款编写瑶族通史。与本研究相关的主要有:

1. 《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

关于凌云瑶族的调查,最早可以追溯到颜复礼、商承祖的调查。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后进行的我国少数民族的首次调查研究,就是关于瑶族的调查。1928年7月22日至8月18日,颜复礼、商承祖前往广西凌云县瑶族村寨调查,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当地被称为红头瑶、蓝靛瑶、盘古瑶、长发瑶的生活习俗和语言,1929年出版的《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是为“中国民族学实地调查最早之作品”(徐益棠1946年在《中国民族学之发展》一文所语)。

那时,交通不便,从广州出发,坐船到梧州,从梧州坐船到桂平,然后到南宁,从南宁到右江到百色,每一段约一天时间;从百色到凌云200余里山路,需3天时间。前辈们前往调查点花了10多天,而现在2天就足矣。

《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下称《报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广西省概要;

① 张有隽:《瑶族研究国际化述论》,载《瑶学研究》第4辑,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8~18页。

(2) 调查范围及结果, 红头瑶、蓝靛瑶、盘古瑶、长发瑶之住处、职业、婚丧习俗;

(3) 凌云瑶人语言之比较研究及与傣族语言之关系;

(4) 凌云瑶人传述中之瑶族来源;

(5) 凌云与广东韶州瑶人之交互关系(根据语言比较之研究);

(6) 根据地名研究瑶人分布之情况;

(7) 凌云瑶族中采集之民族物品录;

(8) 插图目录。

《报告》关注了调查地当时的环境背景, 曰: “去凌云约五百, 其两旁石山俱成峭壁而成一峡, 高约二百公尺。凌云河蜿蜒自北而南, 至百色会于右江, 凌云遂依天然形势以为屏障。东据寿桃山, 西据五指山, 只于南北两面天然孔道, 据两旁山坡, 加以人工之防卫, 筑一石头城。凌云城本身位于盘谷, 纵横数十里, 人口有八百余户, 约四千余人。”这资料对后人的追踪研究提供了范围依据。

正文首先简要介绍了红头瑶、蓝靛瑶、盘古瑶、长发瑶的名称、住处、职业、婚礼、丧礼、瑶头等, 涉及了经济、政治、习俗等方面, 让读者了解了研究族群的概况。如红头瑶男女以红布裹头, 因以得名, 今虽改换蓝布但命名仍未改变, 红头瑶自称 *gou*; 蓝靛瑶因盛产蓝靛而得名, 自称 *buhung*; 盘古瑶由其所崇拜之盘王偶像而得名, 自称 *mun*。《报告》也记载了各族群特有的习俗情况, 如红头瑶的结绳刻木、养蜂、捕鸟, 蓝靛瑶的狩猎、歌谣等。文章以红头瑶、蓝靛瑶的记载为主体, 甚至注意到了两者间性格特点的不同, 得出红头瑶“笃实古朴可靠”、蓝靛瑶“固执多疑”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 《报告》在介绍瑶人时选取了传说、地名的内容来进一步考究其来源与分布, 这是值得借鉴的。书中指出蓝靛瑶有东西两个来源, 从南方十万大山(广东钦廉道与广西南宁道交界之处)与广东北部迁来, 盘古瑶的传说也认为其从南方漂渡而来。

《报告》的突出之处还在于其从语言方面作了各族群关系的比较研究。书中指出凌云四瑶族的语言最显著的特征是名词前之形容词倒置其后。这与印度支那之泰族相似, 得出中国苗族种族为泰族之支流的结论。在考据凌云与广东韶州瑶人之交互关系时列出了两方语言的语根相似者, 初步确认了其关系。可惜, 这里收集的语音还不够大量。

该报告是早期研究瑶族的论著, 限于当时条件的简陋与环境的艰苦, 整个报告只记载了几个瑶族支系的生活习俗和少数语词, 显得有些粗疏简略, 也没有得到太多比较研究后的结论, 明显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当然, 总体来说, 《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仍是我国早期研究瑶族的民族学人类学重要文献。